



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研究方法举隅^① ——以“文学”概念为例

余来明

摘要: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是冯天瑜先生提出的一种学术研究思路。其义是通过考察关键术语、核心概念的古今演变、中西对接的演绎过程,透见其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。以“文学”概念为例,可窥见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意义。

关键词:历史文化语义学;近代转型;学术分科;文学

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换,标志之一是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。晚清以降,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扩展,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观念上的差异日渐突出。一方面,“格致学”(自然科学)诸科自输入后迅速生长,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;另一方面,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经学、史学等在西学冲击下瓦解、分化,形成近代学术分科中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科,实现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换。而其间转换的关键,与某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变化密切相关。通过考察词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,可以透见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这一学术研究理念,冯天瑜先生概括为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^②。其中包含了理论、方法及实践等层面的价值,对于考察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的一般理论

思想文化的演进,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核心概念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。德国学者卡尔·曼海姆(Karl Mannheim)指出:“同一个词,或同一个概念,在大多数情况下,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,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”^③当词语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,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就会形成固定、单一的内涵。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,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词语被用于不同的情境,其指示性也随之变得模糊,在原有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义项,以至于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,因具体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。

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,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概念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。陈寅恪在《致沈兼士》中提出:“凡解释一字,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^④作为历史学家,陈寅恪对“字”(概念)释义的认识,显然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,而是强调在对概念展开溯源讨流的同时,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承袭、改

^①谨以此文献给冯天瑜教授七十周年诞辰。

^②冯天瑜:《“封建”考论》第2版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,第1~9页。近年来,有学者对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的提法提出质疑(方维规:《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》,载《新史学》第3卷,中华书局2009年,第3~20页)。关于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与西方概念史、历史语义学、关键词研究等方法之间的渊源,以及缘于中西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方法论上的差异,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辨析。

^③卡尔·曼海姆: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》,商务印书馆2000年,第278页。

^④沈兼士: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1986年,第202页。

造、转化、延伸等情形,由探讨词义变化切入,发掘其间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近代历史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历程,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新语的创制演变过程;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想、新事物、新技术层见叠出,是通过不断生长的新语汇、新名词予以表达的。用费正清的话说,即“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”^①。近现代出现的大批名词、语汇,有的是重新创制的,有的从日本直接引进,有的通过对旧语词进行改造和转化。近代社会新语系统的不断扩充和膨胀,是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。章太炎援引日本学者武岛又次郎《修辞学》的论述认为:

外来语,破纯粹之国语而驳之,亦非尽人理解;有时势所逼迫,非他语可以侔代,则用之可也;若务为虚饰,适示其言语匮乏耳。新造语者,盖言语发达之端,新陈代谢之用也;今世纪为进步发见之时,代有新事物,诚非新造语不明。^②

近代以降,伴随西方学术文化涌入中国,其内容大大超出传统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容纳范围。在此背景下,借用日译新语和创造新语势属必然。今人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形成,考察新语生成、演化、定型等过程也就成了必由之径。“新事物”与“新造语”之间的互动,不只是“所指”与“能指”之间的对应关系,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面对产生大量新语的近代社会,文化史、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从考察新语的生成入手对之进行解析,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失。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,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于西方,掌握“话语霸权”的西方文化或经由日本或伴随着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入侵,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输入中国,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思考与变革,新语的不断涌现就是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“本能反应”。近代中国社会新语的大量创制,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转换。冯天瑜先生对此深有体会,多年来一直以近代新语为窗口展开近代历史文化研究:

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,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。君主立宪思想采用“议院、上议院、下议院、国会、虚君共和、君民共治”等新语;革命思想倡用“革命、共和、民权、民治、主权在民”;进化思潮广用“物竞、天择、进化、野蛮时代、文明时代”;自由主义服膺“自由、独立、平等、博爱”;社会主义频用“阶级、资本、资本家、剩余价值、专政、群众、社会主义”……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,没有新语的创制,新思想便无从产生与传播。反之,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,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无尽源泉。^③

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,由于大量术语系的出现而有了不同的路向。新名词、新概念在近代生成、传播,从深层结构上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谱系、人生信仰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,对传统文化的内核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。那些被统称为“现代性”的因素,即是随着不断产生的新语而变得日渐丰富并逐步凸显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历史文化的“话语体系”,成为构筑近代历史的重要内容。

19、20 世纪之交,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日益扩大,一方面,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,大量日译汉字新语涌入中国,使语言体系得以满足对新事物、新思想、新观念的指称;另一方面,大量日译汉字新语的涌入,必然对传统的话语结构和学术体系形成巨大冲击,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“失语”现象。张之洞等人曾试图借助体制的力量阻遏这一潮流:

古人云:文以载道。今日时势,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……日本各种名词,其古雅确当者固多,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。近日少年习气,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,如团体、国魂、膨胀、舞台、代表等字,固欠雅驯;即牺牲、社会、影响、机关、组织、冲突、运动等字,虽皆中国所习见,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,迂曲难晓。又如报告、困难、配当、观念等字,意虽可解,然并非必需此字,而舍熟求生,徒令阅者解说参差,于办事亦多窒碍。^④

① 费正清、刘广京: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下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,前言第 6 页。

② 章太炎:《庵书》重订本,载《章太炎全集》第 3 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,第 227 页。

③ 冯天瑜:《新语探源——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术语生成》,中华书局 2004 年,第 616 页。

④ 张之洞等:《奏定学堂章程·学务纲要》,载瞿鑫圭、唐良炎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学制演变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,第 500 页。

对于身处传统语境中的晚清士人来说,许多由日本输入的汉字新语,字形虽与中国古典词并无二致,其义却“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”,“迂曲难晓”也在情理之中。百年以后,对于已经熟习此类词“新义”的今人来说,其在中国古典中的真解大多已不甚了了。研究者如果以今时之义度古人之见,导致误识也就势所必然。故对今时习见惯用的某些概念进行辨析,考其源流,探讨其中的宛委曲折,也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二、“文学”概念转换与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的方法论意义

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,不少中国古典词都发生了词义的转换,其间大多经历了语义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。以“文学”词义的演化为窗口探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近代转换,是基于对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古今演绎、中外对接所蕴含历史文化意涵的充分认识,文学史、学术史、文学思想史等层面的意义也由此得到很好的体现。

“文学”虽然是中国古典词,但在清民之际的话语体系中,其义却并不明晰。章克标等编译《开明文学辞典》,曾对其间复杂多致的情形颇存感慨:“‘文学’二字,一见其意义似甚明了,然仔细一想,则其内容极为复杂,词义甚是暗昧。”^①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指出:“文学、文艺二词,本为中国所固有,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,而使用的方法,向来很暧昧,含义颇多。自从作为英文 literature 的译语后,概念益觉含混。”^②民国前期的文学史书写,都将辨析“文学”概念的古今中西异同视为不得不予展开的言说:“文学之正变,古今既如是其不同。研讨文学者,所当剖晰而深究之。而述史者则惟本事实以为叙论,界说非所问也。但至今日,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,颇摭拾其说,以为我文学之准的,谓诗歌、曲剧、小说为纯文学。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。”^③当传统遭遇西方,中西“文学”概念之间的对接与融合,以及传统“文学”观念近代转换的复杂过程,都须通过厘析“文学”概念古今演绎、中西涵化的历史轨迹而得以辨明。

考察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转换,可以有多种途径,而“文学”观念的转变是其中的核心内容。吴康关注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“文学”概念的差异,强调在把握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:

昔仲尼述弟子四科,首标文学之名,说之者谓文章博学(邢疏),盖谓博通学术,善为文章,二事兼能,非但操觚载笔为文辞而已。近百年中,海通以还,浸淫欧化,译名新义,风起云涌,特较故训,多有异同。今言文学,乃译拉丁语律兑来 Litterae 谓美文学 Belles Littres 著述之总称也。美文学者何?谓讲究为文之术,谨严弘丽之作,若文法,雄辩(修辞学),诗歌诸学是也。拉丁又言律兑拉杜 Litteratura,由律兑来孳乳而生,即今英法德语文学一词所本(英 Litterature,法 Littérature,德 Litteratur)。^④

西方近代“文学”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,有“外周”与“内涵”之别。其中“外周”诸义,与广义的“学问”类似,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,可作以下分类:一,“文学为美文学智识之总称,如庠序所设文学课程,凡文法、修辞、诗歌诸科讲授,皆在其中”;二,“一文学作家之篇章,或其著述全部,如司马相如之文章,亦曰司马相如之文学,言其所作三篇,如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之流,或其生平著书之总也”;三,“文学职业,如曰专意肆志于文学,谓委身于文艺作业也”;四,“一民族,一国家,一时代文学作品之总量,如犹太文学,中国文学,英伦伊利萨白 Eliazbath 朝文学其例也”;五,“地方一时代文学作家之全体,如云全体文学称扬或攻驳某书某人也”;六,“讨论一问题著作之总体,是为书目,为经籍志 Bibliography,如探究唯心论之书目,可曰唯心论之文学,论述社会注意派之经籍志,可曰社会主义之文学也。”又有广义、狭义之分:广义“文学”,与“科学”相对,相当于人文科学,包括哲学、历史、文艺、政治、社会诸学,“凡述情状物,辨理纪事,但施之文字记载,即得溢曰文学,是乃著述之总称,方策之称号矣”;狭义“文学”,即所谓“纯文学”,“则为著述一部分之专名,以宣扬意志、发舒情感之作为归,不拘叙事述情辨理之篇,皆以艺术精工,条理明密,思想深远,始得号曰文学,则散文之论辩、史传、小说、述记,韵文之诗歌、剧曲等类是也”。之所以对古今中

①章克标等:《开明文学辞典》,开明书店1933年,第411页。

②长泽规矩也:《中国学术文艺史》,世界书局1943年,第11页。

③曾毅:《订正中国文学史》,泰东书局1929年,第21页。

④吴康:《比较文学绪论》,载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: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(1919~1949)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,第25页。

外“文学”概念予以细致考辨,正是认识到其间的差异及由此反映学术体系的不同。

“文学”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存在“文献经典”、“文章博学”、“学问”等义,又被用以指代“儒学”、“理学”,虽为“孔门四科”之一,却并未形成独立形态。清民之际,随着西方新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输入,“文学”概念经历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,演为用以表述近代分科体系中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。朱希祖撰《文学论》一文,对“文学”观的中西差异及其近代转换予以详细分述:“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,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”,中国传统“论文学者,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:凡无句读之如图画、表谱、簿录、算草,有句读文如赋颂、哀诔、占繇、古今体诗、词曲之有韵文,学说、历史、公牒、典章、杂文、小说之无韵文,皆得称为文学”,西方近代学术则“政治、法律、哲学、文学,皆有专著”^①。有见于此,朱希祖指出,要正确把握“文学”概念的中西差异,必须认清“文章”与“文学”之间的差别:“盖前所论者,仍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,不过分为说理、记事、言情三大纲耳。此以言文章则可,言文学则不可。何则,文章为一切学术之公器,文学则与一切学术互相对待,绝非一物。”言下之意,以文字记载历史、哲学甚至自然科学诸科内容的,亦不妨为“文章”;而“文学”则是作为与历史、哲学等科同级的学科分类,范围较“文章”要小得多。

近代分科体系中的“文学”,主要是在汲纳西方(经由日本)近代“文学”概念基础上形成的。其中一个重要表征,是“文学”概念的古今转换,由传统的“学术”演变为指语言艺术的独立分科。民国九年(1920)十月,朱希祖作《中国文学史要略叙》,叙述1916年至1920年间“文学”观念的变迁:

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,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,与余今日之主张,已大不相同。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,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,以为文学必须独立,与哲学、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,所谓纯文学也。^②

《公言报》曾发表《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情状》一文,概括评述了1919年前后北京学界的各种思潮。文中将朱希祖视作介于新旧二派之间的代表人物:“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,邃于国学,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,故于旧文学之外,兼冀组织新文学。惟彼之所谓新者,非脱却旧之范围,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,而在于改良。”^③在朱希祖个人,反映的不过是其文学观念的变迁。但从整个文学界思想界的状况而言,却包含了一段深刻的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学观念史演变的曲折历程。伴随这一过程的,是中国学术史、中国文学史观的巨大变化。

“文学”观念的近代转换,使得“五四”以后的学者在论及“文学”词义时,都开始将古今词义的变化纳入关注的视野。如舒新城(1893~1960)主编《中华百科全书》释“文学”云:“(一)孔门四科之一。《论语》称‘文学子游子夏’,疏谓文章博学,就所称文学皆此义。今世界所称文学,有广狭二义:狭义与哲学、科学相对峙,专指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而言;广义该哲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等言之,亦谓之文的科学。”^④戴叔清编《文学术语辞典》,“文学”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为 literature,具体释义,同样作了广、狭之分:“把用言语文字表现的人的精神的产物称作文学。在狭义方面是说诉之于空想及感情的艺术的作品。普通称作纯文学的就是这个。广义地说的时候,包括在文字里所表现的一切的记录,哲学,历史等。”^⑤由此不难看出,“文学”概念在近代的语用实践中经历了古今演绎、中西涵化,词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通过概念演化的窗口,透见的是古今中西文学史观和文学学术体系的差异:中国传统以广义的学术为“文学”,近代以后受西方(经由日本)影响,形成了以狭义“文学”为基本内容的“纯文学”史观。

● 作者简介:余来明,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,文学博士,历史学博士后;湖北 武汉 430072。

● 基金项目: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(07JZD040);武汉大学“70后”学者学术发展计划

● 责任编辑:桂 莉

① 周文玖:《朱希祖文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,第45~55页。

② 周文玖:《朱希祖文存》,第352页。

③ 蔡元培:《蔡元培全集》第3卷,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,第277页。

④ 舒新城:《中华百科全书》,中华书局1936年,第140页。

⑤ 戴叔清:《文学术语辞典》,文艺书局1931年,第11页。